西方轴心文明、中华文明与生态文明

[美]小约翰·柯布撰 张海燕译

摘要：在 2500 年前的轴心文明时代欧亚大陆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大批原创性思想家。中华文明此时也有突破。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但最核心的影响则是儒家学说。西方文化强调公正，儒家思想强调和谐；强调公正会导致批判和改革，而强调和谐则呼吁接纳和协同；公正的要求倾向于打破共同体，和谐的诉求则倾向于强化共同体。因此，儒家文化社会比西方文化社会更加稳定。轴心文明时代形成的西方文明传统最终导致工业文明，科技统治世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应当建设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首要基础是中国文明。而若西方也选择生态文明并与中国生态文明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最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轴心文明；中华文明；生态文明

中国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 (2019) 03-0107-05

当我们谈及“文明”时，有时我们是指人类发展的某个共同阶段。在这个用法中，文明就与建造大型楼房、人们向城市迁居的活动关联起来。随之而来的则是书写和文字的发明以及社会化管控大量人口之类的成就。

这样的文明总是被人们视为进步，然而这种所谓的“进步”却代价高昂。在多数情况下，文明社会等级森严。在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大多数建筑都是靠奴役般的劳动建造而成的，我们可以猜测，在建筑期间会有无数劳工殒命。在多数情况下，妇女变得更加温顺。政治权力则集中在军事首脑手中，主要的权力形式依赖于威权；而且凡是先前的大多数社会可相对持续存在的地方，城市总是会破坏它们的环境。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对大多数城市居民而言，城市生活并不比他们生活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

会里更强。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奴隶和手工业者们，有理由羡慕那些生活在文明疆界之外的部落“蛮夷”，只有那些靠剥削奴隶劳动为生的城市自由民，才有时间发展人际关系、积累相关知识和培养艺术才能。而正是这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才让“文明”一词对于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而言成为褒义词。

保罗·舍波德（Paul Shepard）在这些问题上使我受益匪浅。他对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会抱有极大的热情，而对文明社会则予以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当年在美国西部荒原，年轻小伙子离家出走，自愿加入原住民部落的事情并不少见，而年轻人自愿从部落往移民社区跑的例子却从未见有报道。他指出，人类数万年来演化使我们非常适应狩猎采集生活，而文明驯化我们的方式却与我们深层的天性相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心理和社会问题的

根源。这种说法有助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那时，我就认识到而且如今仍然认为，我们已不可能回到从前这种自然阶段了。文明导致了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现在，自然环境已急剧恶化，这个星球现在只能支撑当下极少一部分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因此我们必须调整文明对其居民的要求。

在我看来，两千五百年前文明取得了一次重大进步。我赞成雅斯贝尔斯称这个时期为“轴心时代”。欧亚大陆上几个彼此基本没有联系的地方各自独立地产生了一些思想家，他们提出了一些深刻的基本问题。他们没有因袭前人的思维，而是质疑当时已有的信念体系是否准确和妥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如何发展和更新。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观点纷呈，新见倍出，无疑反映了他们生活于其间的文明各有千秋。或许，如果我们知道得足够多，我们会发现每个主要城市的文明各具特色。我对文明总体上所作的批判对一些城市来说比较符合实际，对另一些城市来说可能不准确，但是若说到当今的文明，很多古代历史事实今天已不再重要。轴心时期的传统当然现在还深植于文明的特色之中，那时的传统对文明的塑造一直延续到今天，因而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明的灭绝也可等同于轴心时代的结束了。

为了简化这个无法穷尽的话题，我将考察四个轴心时代的文明，它们对理解现存的文明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将从雅典人开始考察，并且主要集中考察柏拉图。显然，在他之前雅典已有一大批思想家组成的共同体，正是这个共同体才造就了柏拉图。

有两个学术共同体对他的思想有贡献。其一是数学家组成的共同体。显然，在所有文化共同体中都有一些人对数字和形状感兴趣。然而无论在数学的发展上，还是在思考数学实体的地位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反思，雅典人都可谓思想极其丰富多彩。

其二是智者共同体，这是由一群修辞学教师所组成的。雅典是个民主城邦，自由的男性都有权参与公共行动的决策。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议题。为了自己的主张能得到申张，人们需要说服其他人。那些最擅长说服之术的人通常在政治上最成功。于是，年轻的雅典市民都要寻找能帮他们变得能言善辩的教师，这些教师就是智者。

无疑，智者主要都是德士高人，他们希望帮助年轻人明智地引导市民，然而他们却特别地专注于说服方法。苏格拉底认为，他们只应该劝人做真正的正义良善之事。于是，对他而言，专注的焦点应转到什么是真和善上。对这类事情，一般智者主要靠因循惯例的集体智慧来解决。而苏格拉底则以轴心时代的典型方式竭力使人们认识到，他们以为自己原本就知道什么是真和善的这种假设是错的。他发展出一种辩证方法，旨在推动人们对这类事情的思考达到新的层次。

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非常乐于称赞苏氏所做的贡献。我们每每总是通过柏拉图才得以了解苏格拉底。也正是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才得以与缘自形式本体论地位的数学发展融为一体。柏拉图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对智慧的爱，启迪了其数千年后的后来者。诚然，我们在其他地方以其他方式也可以探究智慧，但是在西方，“哲学”就是如此这般地与柏拉图学派的传统息息相关，因而迄今我们仍然争论在其他文化中是否存在哲学。

哲学对待宗教问题与对待其他问题的态度别无二致，它通常会把学生们从标准的希腊——罗马时代世界的宗教教义中解放出来。通常这些教义都有占星术的特征，以行星为神祇，但是哲学对智慧的探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维度则更强。柏拉图学派中也出现过各种神秘主义形式，新柏拉图主义既可被称为哲学，也可轻松地被称为宗教。显而易见，柏拉图所鼓励的那种思维在当代世界文明中仍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代人难以理解以色列的贡献，但是很少有人会质疑其在西方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希伯莱人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在国王的宫廷中奉养预言家的传统。预言家们以热切的预言支持国王的任何计划。

与很多民族一样，他们也有自己信奉的神。在他们的传说中，有一位神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并带到了他们现在的居住地。这位神的拥护者们强调，他们应当只敬拜这一位神。对他们中一些人而言，献身于这位神要比服从国王更重要。他们所理解的这位神，在他们为奴时就捡选了他们，会关

照诸如孤儿寡母和外邦人之类的无权无力者。偶尔，这位神的追随者们在国王的计划不公道时也会作出忤逆上意的预言。他们把神的意志阐发为一套高于一切人类律法的复杂法律。最后，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预言家开始断言，他们的神其实是唯一的神，而所有其他人所崇拜的只是偶像。他们的神是真神，是天与地的创造者。他们的神是万神之神，神的意志指向公平与正义，而非宗教性的仪式和献祭牺牲。先知耶利米更以毫无歧义的论证把这个意思推证成了严格的一神论。

这位唯一的神至今仍被理解为他曾把希伯莱人民从奴役中拯救出来，而且在他们的历史中这种拯救一再重演。神召唤人来宣证神的意志，哪怕其有违世俗权威。但是，这些被召唤者宣证的典型消息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消息，神继续在历史中行动，经常颠覆人类的预期。世俗权力由神授予，且以服从神为条件。神以为真者方为真，神以为义者方称义。希望就在于神的意志在历史中必将实现。

这些信念让希伯莱人以及后来的犹太人成为“特殊”的民族。在整个罗马帝国中，独有他们拒绝皇帝要求的敬拜。他们不断地起义，以致最后他们被流放，被迫远离他们的故土。但是他们所具有的服务于高于任何世俗动机的事业这一意识却感动了许多人。他们的一些训导太过于集中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使得异教徒很难归化为犹太人，但是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式，事奉创造天地、创造历史甚至主导人生的唯一神的理念，已然成为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因素。

在许多文化中，包括部落文化在内，人们发现服食某些特殊的植物或修炼某些特定的法门可能会获得某些特殊经验。这类经验经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体验，并且是宗教中重要的一部分。罗马帝国里也有一些秘密宗教，这些都成为柏拉图主义者和犹太人的轴心时代传统中的内容，但是两边的主流都将这样的修炼边缘化了。

另一方面，在印度，个人能获得优越的灵性状态被普遍地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最优秀且最智慧的人都会投身于这一探究，并与他人分享他们的体验和知识。甚至那些以感官经验为一手知识的人，他们关于现实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他们从已在特殊意识状态中获得真知的人那里所习得的。

公元前六世纪正是获得此类经验的不寻常的高峰期，印度的主要思想和灵性学派都来自于那个时代，其中在印度以外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佛教。

但是，这些伟大的印度神秘主义者们的灵性修炼难度太高了，在后来的很多世纪里无人能超越他们。其实他们所设立的榜样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后来的修炼者能冲破世俗成见。在有些例子中，有人发现自己最深刻的自我与万事万物最深刻的实在可合而为一，灵魂即是婆罗门，或者自我就是梵。而在另一方面，佛陀又教导说，世上无灵也无神，只有缘生缘灭在不断地流变。领悟此道的人就能免于一切执着。因为执着是苦谛之源，所以不执着就能脱离苦谛，不执着乃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证得菩提大道或与万物合一的高僧大德们可为他们的信众提供智慧和指引。一个人可以在没有觉悟的情况下成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现实是一切执着所扭曲的流变，即使在另一层面上世界是由持续的客体所构成的。

虽然一神论者经常瞧不起多神论文化，但是他们却格外地认同印度的灵性成就不能被简单化地称为原始或素朴，而且近来的科学进展已倾向于证实灵性经验所指向的一些信念为真。灵性修炼的很多印度形式吸引着全世界的人，寻求全球文明的人不能忽视它们。

在哲学兴起于希腊的大约同一时代，希伯莱人确定无疑达到了伦理上的一神论，印度的灵修实践得到了最精微的表达，中国人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取得了突破。从我们目前未能欣赏到人类充分地参与自然界来看，前面我们所讨论过的成就都不恰当。它们都表达着人类的独特性，甚至表达着人类与大自然的分离或疏远，并因享有这一文明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轴心时代所涌现的文明中，只有中国把人性完全归根于自然，并有人法地、地法天的训导。这是一场文明内部的运动，其指向是质疑文明本身最深刻的动机——为人类特有的目的而控制大自然。它教导文明应该在大自然中寻求“道”。

把中西方绘画作一对比就可使双方的差异立刻显现。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中虽然有人，但人物与牛羊和群山一样，都是山水的一部分。而西方绘画则常以人物为主体，风景只是人物的背景而已。有一

些画中只有风景，但是一旦画中出现了人物，他们就几乎必定要占据主要画面。

道家思想家老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但是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则居于更加核心的地位。在有些方面，儒家思想看起来不如同时期的其他传统那么“轴心”。儒家并不像其他轴心时代的思想那样质疑传统习俗，但是儒家明确地把习俗提升为思想对象，然后对其加以选择和排序，把它们融合为内在一致的整体，而这种行为正是体现轴心思想的行为。

西方关于社会的思考通常倾向于强调公正的理想，而儒家思想则强调和谐。追求公正的规范几乎必然要进行批判和诉诸改革，而追求和谐规范则呼吁接纳和协同。公正的要求倾向于打破共同体，而和谐的诉求则倾向于强化共同体。孔子支持接受社会的等级秩序，但他却竭力呼吁掌权者要为社会的整体福祉而使用权力，同时号召下级民众要接纳这一结果，即使掌权者没有明智地为社会整体谋福利。儒家社会通常要比西方社会稳定得多。

虽然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极为不同，但中国人却能体悟到这些思想的相互兼容。孔子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可以解释为恭顺更大的自然，孔子所追求的和谐并非全然不像任自然界自由发展所产生的生态和谐。中国文化既追求人类之间的和谐，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这种追求并非总是能获得成功，但是这种文化却常常能同化那些试图颠覆它的人。

在最近几个世纪里，西方轴心文明主导了世界。如今它将经受严格的审查，接受理性的批判，而印度和中华文明则在重拾领袖地位。那些原来被轴心文明所忽略的所有众多本土民族文化也是如此。为了给我们自身在文明史中定位，我将把话题转回到西方。

在罗马帝国中有几个世纪的时期，尽管一神论以基督教的形式在传播，犹太和希腊思想的传承则仍然各自保持着其独特性。希腊学派的传人们虽然看不上基督教的福传，但基督教运动的大部分领袖人物还是很认可并越来越欣赏希腊思想的卓越。这种状况到了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愿意放弃压制基督教，转而支持它，以换取基督徒支持他的统治之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当所有其他希腊——罗马学园都在“蛮夷”的进攻中被摧毁之时，基督教会却得以幸存下来。在中世纪统治欧洲的基

督教教义思想本来是希腊和希伯来两大思想的综合。但是，正如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所见，这种思想综合是由基督教方面创造性地完成的。希伯来传统强调历史；而把理解自身与不断变动的事件相联系，并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传统则可以吸收诸如希腊哲学之类的非历史思想传统，然而反过来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说到全球文明，这种西方文明通过自十五世纪以来的航海大发现、野蛮征服和殖民运动的扩张，可谓意义重大，居功至伟。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已占据主要的历史画面。孕育自中世纪的技术进步让全球扩张成为可能，由基督教世界分裂而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竞争为全球扩张提供了动力，基督教愿所有异教徒都归化的目标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发端于希腊城邦时代的数学与中世纪发展起来的技术相结合，推动了科学的兴起。实际上，一神教或一神论也是这种新科学至关重要的基础，因为它所导致的信念是，在无限多样的事件表相之下存在着由造物主的意志所设定的自然规律。这种假定或者信念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很多科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达，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学习上帝的意志。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把基督教中的许多观念当作迷信来反对，但是他们所默认的立场则是“自然神论”，相信造物主上帝不仅颁布了道德法则，同时也颁布了物质规律。基督徒支持科学的进步，他们相信，这样做能更多地领略上帝的奇妙神工。

到了十九世纪，科学与技术相结合使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达到了难以想象的深广程度。电学和化学已经使世界大变模样，面貌全非。科学再也不只是简单地探求知识了，科学对于财富和权力甚至日常生活而言，此时已变得无比重要。

一神论文明直到十九世纪才受到科学的威胁。基督徒因为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而接受了自然与中世纪的大钟同样可以被理解的观点。科学家们发现了自然现象背后的钟表机构和工作原理。他们可以这样接受，因为科学家们跟随基督徒的思想而假定，人类并不是这个机械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达尔文却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证明大自然不仅是经过千百万年的逐渐发展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就连人类

也是这场演化发展的产物。

这种科学的发展导致了文明的危机。它意味着要么大自然比科学家鼓励我们去假设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要么人类以为自己的决定会影响所发生的情况纯属自欺欺人。到了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学接力进行了这场危机的第二棒。他们只管理头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无意识地在工作，人类此时无异于行尸走肉。

当不再考虑价值观时，那么默认的价值就是金钱。经济主义如今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是，以赚钱来主导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实际上真是不行，因为它只能加速我们奔向全球大灾难。这种做法同追求自然神形式的基督教文明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比拟。西方文明如今处于混乱状态。

糟糕的是，在这种混乱状态趋于白热化之前，西式大学已遍布全世界。在公众的头脑中，大学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已成为全球文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大学不教人们智慧地使用科学技术，不讲授人生的意义，对这种现象几乎无人觉察。

也许西方文明的崩溃是一种恩赐，这为我们考虑文明在全球一体化情况下进行更新敞开了空间。我们是想要一种能把所有以往的文明要素都综合在一起的文明呢？抑或我们想要多元的文明，以便能彼此吸收各自的优点呢？

我的希望是生态文明能被全世界接受。但是我相信，最好的结果是要有多种多样的生态文明。若是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建成以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事实上，我更喜欢与此略有不同生态文明，即我相信，生态文明的首要基础是中国文明；因此，我将提出建设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生态文明。

在美国，我则希望通过更新以色列先知传统，以其强烈的超越感和历史感，彻底颠覆当前对经济主义的全力追求。事实已证明，这种以色列先知传统可同化其他传统的智慧，并且它有许多这类需求。它也必须致力于实现生态文明。这两种生态文明可以继续相互学习，但是没必要消除两者的不同。一个保留差异性的世界要比单一均质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和强健有力。

参考文献：

- [1] Alfred North Whitehead. *Adventures of Idea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 [2] A.H. Johnson. *Whitehead's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62.
- [3] David Ray Griffin. *Unprecedented: Can Civilization Survive the CO₂ Crisis*[M]. Clarity Press, 2015.
- [4] Shivaji Lokam. *The Fall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ow Liberalism is Destroying the West from Within*[M]. Entropy Works LLP, 2018.
- [5]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 [6] Hall, David. *Modern China and the Postmodern West. in Culture and Modernity: 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ed. Eliot Deutsch[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
- [7] Marcus Ford and Stephen Rowe. *Educating for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M]. Process Century Press, 2017.
- [8] Joe Holland. *Postmodern Ecological Spirituality*[M]. Pacem in Terris Press, 2017.
- [9] Kevin MacKay.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ligarchy, Collapse,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Z]. *Between the Lines*, 2018.
- [10] Zhihe Wang. *Process Pluralism: Chinese Thought on the Harmony of Diversity*[Z]. Ontos Verlag, 2012.
- [11] 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M]. Simon & Schuster, 2015.

作者：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美国科学与艺术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Arts）院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USA）院长

译者：张海燕，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

校者：杨富斌，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钟晓媚